



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的 光辉成就

胡寄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世界范围考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胡 寄 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

光辉成就

胡 寄 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 $\frac{3}{4}$ 印张 49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册

统一书号：4190·091 定价：0.28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尚书·禹贡》中的财政负担平均的思想	(5)
二 《周礼》中的市场管理原则	(7)
三 《论语》中的财政思想	(7)
四 《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	(8)
五 春秋战国之际重视劳动人民休息的观点	(10)
六 战国后期墨家的价值概念	(11)
七 后期墨家关于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	(13)
八 古代的农业经济循环论	(14)
九 公元前五世纪的市场价格理论	(16)
十 先秦的经济的功利主义观点	(18)
十一 公元前四世纪对分工必要性的精辟阐述	(19)
十二 白圭的经济概念——“欲长钱，取下谷”	(22)
十三 先秦的国家货币流通基金概念	(23)
十四 《管子》的“侈靡的消费观”	(25)
十五 先秦时代的货币量数说	(27)
十六 《管子》中的市场价格均衡运动	(28)
十七 《管子》中的差别价格概念	(29)
十八 公元前三世纪的欲望论	(30)

十九	公元前二世纪的“法钱”概念	(31)
二十	公元前二世纪的限田思想	(32)
二十一	从先秦到汉初的自利观点	(33)
二十二	公元前二世纪对农、工、商各业营利能力的看法	(35)
二十三	先秦汉初论货币贷放问题	(35)
二十四	公元前二世纪的合理货币利润率概念	(36)
二十五	公元前二世纪初的货币统一思想	(37)
二十六	公元前一一〇年的平准措施	(38)
二十七	公元前一世纪的大规模生产经济概念	(39)
二十八	公元一世纪的市场价格评定制度	(40)
二十九	公元一世纪的利息概念	(41)
三十	公元一世纪的成本核算概念	(42)
三十一	公元二世纪的万年“太平”思想	(43)
三十二	公元一世纪到五世纪关于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	(44)
三十三	公元三世纪初的人口概念	(45)
三十四	公元三世纪的全国职业规划思想	(47)
三十五	公元三世纪出现的租税原则	(48)
三十六	公元四世纪的货币拜物主义	(49)
三十七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封建地主的家庭经济学	(50)
三十八	公元五世纪的“自由铸造”思想	(52)
三十九	公元八世纪的两条行之有效的财政原则	(53)
四十	公元八世纪的商业情报网	(54)
四十一	公元八世纪的财政稽核职能独立的概念	(55)
四十二	公元七八〇年的“量出为入”财政原则	(56)

四十三	公元八世纪的租税负担能力原则	(57)
四十四	公元九世纪关于租税转嫁及其对市场价格 影响的观点	(57)
四十五	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国家财政的预决算思想	(58)
四十六	十一世纪关于经济放任必然产生兼并或垄断 的思想	(59)
四十七	十一世纪的货币流通速度论	(60)
四十八	十二世纪论通货贬值对物价的影响	(61)
四十九	十二世纪及以前推行的类似近代所谓“公开 市场活动”	(62)
五十	十二世纪会计监督思想之萌芽	(63)
五十一	十二世纪的“称提”之术即发行兑换纸币的 原则	(64)
五十二	十三世纪的不兑换纸币条例	(66)
五十三	十四世纪中叶的流水作业法	(68)
五十四	十五世纪的运输统计	(69)
五十五	十七世纪社会经济的历史进化观	(70)
五十六	十七世纪“耕者有其田”思想	(71)
五十七	十七世纪对城乡土地差别处理的理想	(72)
五十八	十七世纪类似所得税的设想	(73)
五十九	洪亮吉的人口论	(74)
结束语		(77)

前 言

人们大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光辉的哲学成就，中国人民常以此而自豪。至于中国古代也有光辉的经济思想成就，知道的人就是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并不甚多。不少人只约略领会祖国古代似乎有某些足值称述的经济思想，但从来也不曾有人敢于设想将它同西洋古代经济思想相比拟，至于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更是自惭形秽。中国学者尚且如此，故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还有西方经济学者妄言：“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①若连中世纪都比不上，更不用提希腊、罗马了。只有日本学者田岛锦治才在其《东洋经济学史》中对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大加赞扬。^②惜乎他真正颂扬的是儒家思想，与经济思想不完全是同一性质。在西方，只有法国经济学者才正视了这个现实，公开承认重农学派曾从中国古代吸收了不少有益的哲学思想。^③实际上，其中也有经济观点，只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还只是哲学家的副产品而已。如果近代

① 泰罗：《东方的经济思想》，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转引自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选辑》第1页注。

② 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经济思想》，本庄荣治郎集，1953年。

③ 参考Gide Rist, *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P.P., z; 38—390

经济学承认重农学派是它的一个重要渊源，这就很难说它不曾受到一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现在需探讨的问题是重农学派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任何一个经济学者只要不抱成见，均可能发现重农学派的所有重要经济概念都可以从中国旧经济思想中极容易地找到它们的近似样品；相反，在欧洲先行思想材料中倒不易碰到这种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似难仅用“巧合”来解释。

也许不少同志当听到这种设想时会大吃一惊：中国人对高不可攀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建立会有所裨益？！关于此问题有必要说明几句，这并不完全是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也由于如不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将要探讨的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也难以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原理，人们既然有某种水平的社会经济组织与活动能力，就必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得到它们的反映。中国至迟自周王朝起，就已形成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封建王国，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间除少数几次短期分裂外，社会经济保持着较长时期的持续繁荣。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前后，就曾受到中亚细亚不少民族的赞赏。自七世纪以来，这种经济繁荣曾吸引了数十万阿拉伯及波斯商人前来聚居在她的许多大城市之中。十三世纪到过中国的欧洲旅行家们莫不称赞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请想想看，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经济思想或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这种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来，将

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经济之谜。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科学“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所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①

既然古希腊人在商品生产等问题上可以表现出“天才和创见”，为什么已具有三千年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中国人民就不可以在这种领域中表现出“天才和创见”？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已肯定古代思想家在一定商品货币关系上所得出的原则和定理能“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②而我们却不敢承认这一事实？所以从经典著作的启发中可以知道，在古代是可能存在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足资珍视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下面将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这里有一点需要先行说明，我们并非全面介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成就，而是只介绍一些可以同西洋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概念相对比的观点，从而体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就。至于一些与世界经济思想不易挂上钩的观点，无论其怎样独特，我们也只好割爱。例如，《管子》中的轻重理论，的确是很卓越的，其意义与重要性相当于近代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论，但因为在西洋经济学说中找不到同它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5页。

② 同上。

完全对口的理论,我们就不予介绍。另一点是从十七世纪起,中国型经济思想基本上趋于凝固,缺乏突出的发展;相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却蒸蒸日上,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相形之下,中国型经济思想愈来愈落后于世界水平,也就不值一谈了。为了方便计,下面将按历史顺序分问题逐一介绍。

一 《尚书·禹贡》中的财政 负担平均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独立统一时期持续最久的大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它的长远利益，在如何管理国家的财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中最为充实的一部分。但由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均只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地域内有特殊作用，既无较普遍的意义，又难于与西方经济思想作对比分析，故我们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接触到的财政思想，仅为其中极少的几点。现在就先谈负担平均的思想。

《禹贡》这篇文献据说是禹王时代关于赋税制度的记录，近代学者多认其成书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战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价值的经济地理著作。在财政经济思想方面，它记载的财政征课体系反映了负担平均原则。它将九州的田地按土质肥沃程度分为三等九级；对于各州的贡赋负担也相应地分为三等九级。但是田的等级与贡赋的等级均不一致，甚且相差很大。有的州是赋的等级高于其田的等级，有的则低于其田的等级。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距离帝都的远近、交通条件、土地肥沃程度、产品价值以及经济发展等缘故来决定的。例如，冀州的田为第五级，但以距帝都

最近，又有水运之便，而经济又较发达，故其贡赋列为一等一级。又如荆州和扬州的土地肥沃程度较差，距帝都也较远，但以其贡物为“金三品”及纺织品，故其赋的等级也较其田的等级定得高得多。再如雍州和徐州的田的等级很高，但以地远或交通不便，又不出产珍贵贡品，故其赋的等级也定得较低。

这种财政原则在《周礼》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反映，只是不如《禹贡》中反映的突出。它的原则是“轻近而重远”，因为近于王城的居民的劳役负担较重，故“轻近”和“重远”，这正反映了负担平均之意。《周礼》以往总认为是西周初周公所制，近代学者根据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而定其为战国时代之作。可见，关于贡赋负担平均的思想我国古代最迟到战国时期已被普遍重视。从秦汉帝国起，至少在理论上一直成为各代封建王朝公认的财政原则。其原因是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王国中，平均负担的原则无论对封建国家或对贡赋交纳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但这种财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先是由一七五五年德国的官房学者尤士惕（Justi）开其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才成为举世闻名的财政原则。不过一位现代日本经济学者桑田幸三却认为《禹贡》的田的等级不是指土地的肥沃程度，而是指“狩猎”的等级而言。^①这种主张恐怕是不易被接受的。因为“田”如理解为狩猎的话，它本身不可能分等级；如指狩猎的产物，它们已列在贡赋等级之中，也不可能另成等级。

^① 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有关《禹贡》一文。

二 《周礼》中的市场管理原则

《周礼》一书中的《地官》、《司市》条有如下的记载：

“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这是说管理市场商品流通的原则是要运用官府干预和市场价格的作用，使断庄的货品恢复供应；质量厚实、于人有利的货品更加丰富，行苦而不利于人的货品不能出售，侈靡的货品需使减少。这样的市场管理原则，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有意义的。所以，不论《周礼》成书于何时，均不会降低其价值，在对市场管理较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政策似乎更易推行。

三 《论语》中的财政思想

《论语》一书为孔丘的门人所集，约成于公元前五世纪。

书中有如下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的最后一段答词，可谓所答非所问。惟自《论语》出现这一段记载以后，它已成为二千多年来儒家对待财政问题的金科玉律，从来不曾发生过动摇。细察其意，不外乎是要惜民力以培养税源。培养税源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近代财

政学出现以后才有学者加以考虑。更饶有兴趣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法国奠基者，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曾在他著名的“经济表”前面附上一句格言——“农民贫穷则王国贫穷，王国贫穷则君主贫穷。”^① 可谓《论语》中的这句名言在欧洲最早的翻版。

四 《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

《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是大家都熟知的，为分析便利计，抄录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

这里所谓“天下为公”，当然不是专指财产所有制而言。但如结合生产财富“不必藏于己”，劳动“不必为己”以及后面所谓“小康”制度下的“货、力为己”来考虑，其财产观念必然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大同思想要求亲别人之亲如己亲，子别人之子如己子，哪里还可能出现阶级对抗呢？另外，在大同社会中，既然壮者均有工作，

^① Haney(L.H.):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revised edition 1925. New York,p.168)

而且每个人对工作都是非常积极的，“力恶其不出于身”，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人如此，哪里还可能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呢？可以说，大同思想，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主张财产公有，向往一种既无阶级又无剥削的社会。这是一种相当完美的理想社会。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把古代思想现代化了，因为原文并无“财产公有制”，“消灭阶级”、“废除剥削”等字眼。这是一种极幼稚的评语。就是在欧洲，“所有制”、“阶级”、“剥削”等名词术语也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以后才大为流行。中文中流行的这些术语在原文中根本无“所有制”这个专用词；“剥削”是个引伸词；“阶级”的原文还可以是指等级、班级、种类。而且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常以不同的词汇表示同一客观事物。只要所表达的是同一客观事物，名词术语是可以不同的。如必需在古籍上出现具有现代通用的名词术语，才算有这种思想存在的话，则在先秦时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逻辑思维”，更谈不上有“经济”思想了，因为“经济”二字在现代含意上的使用，是道地的东洋进口货。甚至还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阶级的对立，因为有的历史学者说过古代没有“阶级”二字。所以，有必要先行排除这些幼稚的思想。

大同思想还有其他一些特点。第一，它曾注意到由于物质经济生活的完善，因而导致精神面貌的改观，“是故……盗窃乱贼而不出……”。第二，保持了家庭私生活的存在，体现了中国式“乌托邦”的特点。在古代世界中，象大同思想这样

完美的构想是极其少有的。

《礼运篇》一般承认是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战国时代的作品。与此大致同时期的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也曾设想过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可是柏拉图的理想世界，它首先是建筑在大量奴隶劳动血汗的基础上；其次是在社会上三个自由阶级中，只有负责组织管理国家责任的哲学家阶级和保卫国家的武士阶级才能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生活，而属于第三阶级的工农、工、商阶级也只能为前两个较高的阶级服务。此外，还得实行公妻制度，这更是不近人情。^①这样的理想国难道能和大同思想比拟吗！十六世纪名震后世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需有奴隶来做一些又脏又苦的劳动。^②第二部《乌托邦名著》，十七世纪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要求祭司们来管理国家，也要求一些盲、跛、残废的人参加劳动。^③因此，在全世界古代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所能构想出来的反剥削的一切理想中，恐怕大同思想是较为完美迷人的一种，尽管它也同样没有指出我们应当怎样走向大同之路。

五 春秋战国之际重视劳动人民休息的观点

《墨子·非乐篇》中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

①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18页。

②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78页。

③ 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4页

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不仅在此处提到，在其他篇中也不只一次的提到此问题。足见墨家对劳动人民休息问题的重视。从事我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人，没有不知道或不强调墨子重视劳动的，可是发现墨子重视休息的学者并不算多。墨子不仅提倡劳动，而且提倡要强力的从事劳动。如果没有重视休息的观点，那墨家的思想将成为劳动人民的灾难。墨子不只是一般的重视劳动人民的休息。他还将劳动人民休息的重要意义提到关系一国安危的高度。他认为吴王夫差与智伯的失败均是由于“百姓苦其劳”之所致，^①甚至认为“劳苦”是劳动人民产生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②自古以来，一般均将“饥”“寒”看作是劳动人民严重的灾难，而墨子是第一个将劳动人民反饥反寒的斗争加以反劳反苦斗争内容的人。可惜这一光辉思想在秦汉以后二千年的阶级斗争中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欧洲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才掀起了争取标准劳动日的斗争。

六 战国后期墨家的价值概念

《墨子·经说下》有这样一段话：“为非以人是不为非。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屨以买不为屨，夫与屨也。”^③大意是说：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如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也就不一定

① 《墨子·鲁问》。

② “人之所得于疾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墨子·公益》）

③ “为屨以买不为屨”句的“不”字原文为“衣”。孙贻让在其《墨子闲诂》中根据上下文语法及逻辑涵义改“衣”为“不”。学者中接受孙氏校释者不少。